

在欧化与 国粹之间

学衡派 文化思想研究

郑师渠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創于1897

在欧化与国粹之间

——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

郑师渠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 / 郑师渠
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ISBN 978-7-100-16364-4

I. ①在… II. ①郑… III. ①学衡派—研究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3878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在欧化与国粹之间
——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
郑师渠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364-4

2019年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33 1/2

定价：98.00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刘家和 瞿林东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杨共乐

副主任：李 帆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宁 欣 刘林海 安 然 张 升 张 皓 张 越
张荣强 张建华 吴 琼 周文玖 罗新慧 郑 林
庞冠群 侯树栋 姜海军 郭家宏 耿向东 董立河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985”和“211”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被列入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行列，正在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在教学方面，历史学院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出版了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后，一批底蕴深厚、质量高超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如十卷本《中国文化发展史》、二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与政治研究丛书》、三卷本《清代理学史》、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二十三卷本《陈垣全集》和《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上博简〈诗论〉研究》等巨著，以及大型史料汇编《民国史料丛刊》（正、续编）等，这些著作皆声誉卓著，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得到同行普遍好评。

上述著作外，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又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在学科前沿。为了集中展示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我们组编了《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编辑委员会

前 言

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便在于社会思潮的跌宕起伏，五光十色，目不暇接。例如，洋务思潮、维新改良思潮、民主共和思潮、国粹思潮、欧化思潮、进化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实用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国家主义思潮等，瞬息万变。这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亟、社会急剧动荡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强烈反映，它表现了在中国近代历史不同发展阶段上，人们对于国家与民族前途命运的多样化思考。正因为是这样，研究社会思潮成了理解把握近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并为许多学者所关注。近些年来有关论著甚多，其中吴雁南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①，是有代表性的著作。不过，应当看到，思潮是一个内涵宽泛的概念。从纵向上看，一种思潮可因历时而愈显，如进化思潮、民族主义思潮、民主主义思潮等；从横向上看，一种思潮又往往涵盖多样的流派，和而不同，如民主共和思潮中就包含着国粹思潮、欧化思潮、排满思潮等；而20世纪初年在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名义下，实又有东方文化论、乡村建设论、农业救国论、新人文主义等的分别。论社会思潮者，常引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一段名言：“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但稍后一段同样重要的话却又往往被忽略了：“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

^① 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者，非必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各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①综而观之，梁启超对于社会思潮强调了这样几种特点：其一，思潮是因环境变迁与心理因素，人们所形成的思想不期然归趋于一个方向的结果。思潮的发展有其肇端、兴盛和衰熄的过程；其二，思潮既是不期然而形成的，故思潮又是集体的无意识行为，没有计划，没有组织，归趋者也无所谓主动与被动，各不相知；其三，同一思潮内部，往往分成众多小支派，相互辩驳排击，但其中却有着共通的思想观念或称思想出发点。梁启超对于社会思潮共相的概括，有其生动传神之处，特别是仅将思潮限于他自己说的相当于“流行”，或古语“风气”时。但若以近代往往成为社会政治变革运动的先导，并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的各种社会思潮相况，却又不免方枘圆凿。最重要一点是，近代社会思潮虽然都有风起于青蘋之末的特点，但就其重要思潮而言，无一不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的结果。故近代既称思潮，必有主要的代表性人物和作为他们宣传阵地的代表性刊物，以及相知相谋的奋斗轨迹。戊戌维新思潮的代表性人物不正是康有为与梁启超本人吗？《时务报》、《清议报》等不正是他们先后仰赖的舆论阵地吗？民主共和思潮的领袖人物无疑是孙中山，他成立了革命团体同盟会，更创有《民报》，目的是要宣传自己的三民主义，使之家喻户晓。同样，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也正是陈独秀诸人通过创办《新青年》杂志而鼓荡起来的。但是，梁启超所强调的思潮的第三个特点：一个思潮内部往往有众多的支流，相互驳难，体现了思潮的多样性统一，却是提出了一个合乎辩证思维的重要见解。长期以来人们恰恰忽略了这一点。缘上所述，作者以为，思潮的研究是重要的，但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与把握特定的社会文化思潮，避免简单化，还应当重视思潮流派的研究。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作者曾集中研究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一翼，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诸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34，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页。

派及其国粹思潮，并于1992年出版了《国粹、国学、国魂——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一书^①。之后，又选定学衡派作为新的研究课题。遗憾的是，这一课题的完成拖了太长的时间。学衡派与晚清国粹派有一定的联系，这不仅表现为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刘伯明和吴宓曾分别师从章太炎与黄节，胡先骕且列名与晚清国粹派一体的著名的南社；更主要还在于，二者都以弘扬中国文化为自任，在根本的文化主张上一脉相承。晚清国粹派和学衡派，在今天都被认为属于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但我选取它们作为研究对象却并非出于看重保守主义的缘故，而是因为它们独具个性，有助于彰显各自时代社会文化思潮的丰富内涵，同时，也是因为它们被长期轻忽了。对于晚清国粹派，这里不作赘述，只单表学衡派。

人所共知，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潮洪波涌起的转捩点。不过，其内涵不仅是指缘于对辛亥革命后复辟思潮的反省，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对封建旧文化进行了全面而激烈的批判，从而与传统的时代判然划开了界限；同时，还包含着欧战后国人对中西文化关系与民族国家命运的重新审视。欧战后的西方出现了批判理性主义与现代化的思潮。因时代的落差，这一思潮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与新文化运动互相激荡，相反相成，构成了时代弥足珍贵的思想张力。由是，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呈现出新的变动，即由原先的新文化运动一枝独秀，浸成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各领风骚和多元发展的新态势。也因是之故，20世纪20—30年代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流派林立、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重要时期。

以梅光迪、吴宓诸人为代表的学衡派，正是于20世纪20年代初应时而起。其活跃期长达11年之久，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学衡派自身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其主要代表人物多是欧美留学生，且为南北著名高等学府的名教授；二是服膺美国白璧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学衡派将西方的某种“主义”公开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以此为思想指导，这不仅在所谓的东方文化派中独树一帜，而且在其时众多的文化流派中，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三是于新文化运动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与新文化运动相颉颃者，多被目为守旧派，

^① 郑师渠：《国粹、国学、国魂——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时改书名为《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1997年再版。新近复被收入《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文库》重新出版。

但学衡派主要人物却多是归国的留学生，这种似乎反常的现象曾令人们困惑不已。故研究学衡派文化思想，不仅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重要课题，而且更是深入研究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所必需。毋庸讳言，主要是由于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多持批评的态度，故在很长的时间里，受“左”的思潮影响的学术界将之视为反对新文化的守旧乃至反动的势力，加以简单的贬斥。更有甚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原属学衡派的一些人复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吴宓本人且被迫害致死，酿成了悲剧。实则，历史发展从来都是多样性的统一，如前所述，梁启超早就指出了，一个思潮的内部常容有多样的支流，异趣而同质。斯时新文化或叫中国现代文化思潮，是内涵十分丰富、场景甚为开阔的历史现象，其内部存在不同的流派，相互辩驳，却立于共通的观念层面，当是理有固然。但是，由于人们仅仅用传统的“新文化运动”来规范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以之作为分水岭，顺之者进步，逆之者反动，致使本来丰富多彩的历史变得索然无味。同时，也唯其如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学衡派的研究是很薄弱的，以至于当年赫赫有名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学衡派诸子，湮没无闻。

20世纪60年代初，有人建议吴宓写有关学衡派回忆录之类的东西，但吴宓拒绝了。他明确指出，欲客观评价学衡派，当在四五十年之后，而今实非其时。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吴宓的话反映了身处逆境中的学者的心酸与愤懑，但又显示了这位大学者的先见之明。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解放思想，学术环境日趋宽松，人们对于学衡派的看法开始有了变化。相关的成果也渐渐多起来，仅有关吴宓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就已举办过数次。尽管人们对学衡派的认识未必完全一致，但显然已无人坚持原先简单贬斥的观点。不过，从总体看，已有的研究还只是刚刚起步，尤其是将学衡派作为一个思想文化派别做整体和综合性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

本书不仅系统地考察了欧战后世界文化由东西方对立走向对话，以及缘是引起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而且也深入地探讨了19世纪中叶以降，西方人文主义的转型及以白璧德为代表的美国新人文主义的兴起。其目的是要为研究学衡派的崛起及其文化思想，提供愈形开阔的时代大背景。由是以进，本书复具体地探讨了学衡派的文化观、文学思想、史学思想、教育思想和道德思想，等等。作者力图对学衡派及其文化思想做出客观的评价。马克

斯·韦伯曾指出：“社会科学领域里最值得重视的进步毫无疑问与下列情况有关：文明的实际问题已经转移并且有对概念结构进行批判的形式。”^① 欧战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有力地表明了 20 世纪初的世界“文明的实际问题已经转移”：资本主义危机和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已成了为人关注的时代大趋势；“欧洲文化中心论”动摇，世界文化开始由东西方对立走向对话；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受到质疑，人文与科学、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继承传统与创新进取必须协调发展等诸多问题，也愈益成了人们反省的热点。从根本上说，学衡派新人文主义的文化思想，正反映了对业已转移了的文明的实际问题的思考，表现了对既有概念结构的批判。它开拓了时人的思维空间，同时也丰富和推进了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本书不回避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冲突及其固有的失误，但又肯定二者都是在现代思想层面上运作的思想文化派别，其分歧的本质乃在于学理之争，故互有得失；本书指出了学衡派因文化保守的情结，而于传统情有独钟，但又肯定他们从世界人类发展的角度立论，在中西文化问题上，却体现了较比更为健全的文化心态；本书肯定新文化运动是其时的主流文化，学衡派不免于边缘化，但复强调后者同样属新文化的一族。不仅如此，学衡派所反复强调的，在人类社会追求进步与发展的过程中不容轻忽人文关怀的重要命题，无疑又具有可贵的前瞻性。在人们诉求人性和人文精神的呼声日高的今天，其内在的合理性愈加明显。这也正是吴宓诸人重现魅力，为人们记起的重要原因所在。

学衡派诸子多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准确把握他们的文化思想并非易事。作者学养有限，因之，本书疏漏之处，尚祈读者指正。

^① 《科学理论文集》，第 204 页，转引自雷蒙·阿隆著，葛智强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87 页。

目 录

第一章 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

- 一、“西方的没落”与世界文化的对话 / 001
- 二、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东方文化派 / 010
- 三、“科学与玄学”之争的再认识 / 023

第二章 美国的新人文主义和学衡派的兴起

- 一、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 / 030
- 二、美国的新人文主义 / 036
- 三、白璧德与他的中国门生 / 048
- 四、《学衡》创刊与学衡派的崛起 / 054

第三章 “今古事无殊，东西迹岂两”

——学衡派的文化观

- 一、文化运思的理路 / 075
- 二、“以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为己任” / 083
- 三、中西文化观 / 103
- 四、学衡派文化思考的得失 / 125

第四章 “文学是人生的表现”

——学衡派的文学思想

- 一、文学与人生 / 131
- 二、文言文与白话文 / 153

三、旧文学与新文学 / 163

四、旧体诗与新体诗 / 175

第五章 “国可亡，而史不可灭”

——学衡派的史学思想

一、学衡派与西方史学思潮的变动 / 195

二、“中国史学之双轨” / 211

三、“钻研古书，运以新法” / 229

四、论诸子学 / 251

第六章 “教育之改造”

——学衡派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目的，在造出真正之人” / 266

二、突出能力培养，注重宏通教育 / 276

三、“创立我国独立之教育制度” / 295

第七章 “道德为体，科学为用”

——学衡派的道德思想

一、人性二元论 / 306

二、“道德为体，科学为用” / 312

三、支持终极的信念：“宗教实为道德之根据” / 326

四、“天、人、物三界”与君子精神 / 335

五、从学衡派说到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 342

第八章 “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

——学衡派的历史地位

一、学衡派的终结与吴宓的期盼 / 348

二、明确两个前提 / 353

三、学衡派：新文化的一族 / 360

附 录

欧战前后：国人的现代性反省 / 374

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 / 414

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 443

反省现代性的两种视角：东方文化派与学衡派 / 489

主要参考书目 / 512

后 记 / 519

第一章 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

一次大战中疯狂的破坏、恐怖，其高效率与理智化的非人道与愚蠢，给西方式的乐观与自信带来了突然却决定性的——从某些方面言也是永远的——结束。

——〔美〕艾恺

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世界历史由近代转入现代的重要标志。这是人所共知的。不过，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则又可以说，欧战后的世界开始了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新时代。就中国而言，因时人对此感悟不同，欧战后的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发生了新的变动。由是形成的思想张力和搏击，构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契机。这也是我们理解学衡派的文化思想首先必须顾及的重要的历史场景。

一、“西方的没落”与世界文化的对话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绵延4年，参战国达31个，包括六大洲的15亿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这场大战使欧洲1000万人丧生，2000万人致残，许多地区化为焦土，满目疮痍。大战耗资4000亿美元，约占战前各交战国财富总和的一半。战后的欧洲，国疲民穷，处处残垣断壁，一片悲凉萧条的景象。战争惨绝人寰，创深痛巨，使许多欧洲人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失去了信心，陷于悲观、混乱和迷茫之中。因之，彷徨无主、哀叹颓唐、复古迷信之风，弥漫于欧洲大陆。法国著名作家韦拉里1919

年初在与人书中说，欧人危疑彷徨，莫知所措，杂药乱投，实陷于理性危机。“有主复古者，于是欧战方酣之时，人乃争读古书，又虔心祈祷，乞灵于古之宗教。古之英雄、圣哲、诗人、学者，一一奉为偶像，资以鼓吹，一若行其所言世即可救者；而极奇僻、极矛盾之学说教理，各皆有人提倡，有人信从，此兴彼仆，盛行一时，陆离光怪，莫可名状。此种纷乱而复杂之情形，适足见欧洲人精神之悲苦。”^① 据统计，仅巴黎一城，以算命为业者就有40000人，而伦敦更多至不可胜数，“且全城居民，趋之若鹜”^②。不过，韦拉里等人还只是看到欧人的理性危机，而德国的一位青年中学教师斯宾格勒于1918年7月欧战行将结束之时，便推出他的成名作《西方的没落》，径直断言西方文明正面临着没落的命运。斯宾格勒认为，每一种文化犹如有机体，都有自己发生、发展、兴盛和衰亡的过程。欧战不是“民族感情、个人影响或经济倾向的一团一时性的偶然事故”，而是表明西方的“浮士德文化”正走向死亡。《西方的没落》初成于1914年欧战前夕，似乎不幸而言中，故出版后立即轰动了西方。初版9万部，风行一时，其盛况为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以来所未有。

欧战使许多西方人对自己的文化丧失信心，他们痛定思痛，对遥远静谧而又陌生的东方文化便油然而生羡慕之情。故战后的欧洲出现了“崇拜亚洲之狂热”。例如，印度大诗人、大哲学家泰戈尔时在欧洲游历，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东方杂志》记者报道说：“一位宽衣博袖、岸然道貌的印度哲人，降临于中欧兵劫以后的瓦砾场，使一群兵乱流离、惊魂未定的众生，得领略东方恬静和平的福音，以减杀其生命的悲哀。”^③ 当然，不仅是印度哲学，中国文化也在欧洲大行其道，孔子、老子被许多人奉为宗师，其中仅《道德经》的译本在战后的德国就出版了8种。此外，专门研究中国学问的各种团体，也在各地建立起来。一位西方学者说：“东方文化在欧洲之势力及影响早已超出少数消遣文人及专门古董家之范围，而及于大多数之人，

① [法] 韦拉里著，吴宓译：《韦拉里论理智之危机》，《大公报·文学副刊》第10期，1928年3月5日。

② W：《未来生活之新解释》，《东方杂志》第17卷第6号，1920年3月。

③ 愈之：《苔蓀尔与东西文化之批判》，《东方杂志》第18卷第17号，1920年9月。

凡今世精神激扰不宁之人皆在其列。”^①

欧战也令久视西方为自由、平等、博爱故乡的东方民族目瞪口呆，引起了后者对东西文化的反省。印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被时人誉为“东方第一大人物”，他的见解颇具代表性。战后泰戈尔在欧洲各地的演讲，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压迫，他说：“欧洲人是一种有组织之自私民族，只有外部的物质的生活，而无内部的精神的生活，而且妄自尊大，欲以自己之西方物质思想征服东方精神生活。致使中国、印度最高之文化，皆受西方物质武力之压迫，务使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所有相异之点，皆完全消灭，统一于西方物质文明之下，然后快意。此实为欧洲人共同所造成之罪恶。希望青年将从前种种罪行忘去，努力为新世界之造。”据记者报道，泰戈尔“语至沉痛处，声色俱厉，满座为之肃然”^②。其后，泰戈尔访问了中国与日本，并发表了许多文章，继续发挥他的观点，鼓吹复兴东方文化。他强调，我们相信西方文化有自己的优长，它的光明若绝灭了，同处在地平线上的东方也难免陷于黑暗；我们也承认西方的“科学利用物质”法则，将可造福人类，因之西洋人民“有教导世界的使命”；但我们更相信促进人类和平的伟大事业，“必须以某种伟大的、情绪的、豪爽的、创造的观念为基础而后可”，因为创造的材料虽在科学的手中，“但是创造的天才却在‘人’的精神理想中”。西方对东方的侵略，尤其是此次可怖的欧战，足证西方人恰恰缺少此种“精神理想”与伟大的胸怀，若不能改弦更张，“西方人就不免要毁灭这个世界了”^③。其间，中国的许多报刊大量登载泰戈尔的文章、讲演与谈话，一时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日本舆论对欧战的反应也值得重视。1919年日本《新公论》杂志发表《新欧洲文明思潮之归趋及基础》一文，认为欧战已令西方文明的“大缺陷”暴露无遗。欧人从来对自己的西方文明“尊重自夸，未免过甚”，实则文明并非欧洲的专利，例如印刷术等四大发明就是源于中国。东方人于西方文化一般都能热心研究、学习，从中获得教益，但欧人则反之，对灿烂的东方文化却不屑一顾。作者断言，西方文化要想得到根本救治，它也必须向东方文

① （德）雷赫尔著，吴宓译：《孔子老子学说对德国青年之影响》，《学衡》第54期，1926年6月。

② 王光祈：《德国人之倾向东方文化》，《亚洲学术杂志》1921年第2期。

③ （印度）泰戈尔：《东与西》，《东方杂志》第20卷第18号，1923年9月。